

梦想没有灭，由是，道路再曲折，哪怕有一时的挫折，终究能找到胜利的方向。

在李颖的《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中，《国共携手——投身大革命的洪流》篇章中，记录了一段少有人知之事，亦即第一次国共合作促成以前，共产国际最初选择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孙中山和国民党，而是吴佩孚、陈炯明。

提及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寻求与其他政治力量合作，李颖如此表述：“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有坚强的革命性，但人数毕竟比较少，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在李颖看来，共产国际之所以会一时选择吴佩孚、陈炯明，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方面，1920年吴佩孚通过直皖战争掌握北京政府大权后，伪装进步，曾表示愿意与苏俄改善关系，同意接纳苏俄的缓冲国远东共和国使团到北京，并通知原沙俄驻中国使馆停止活动。接着，吴佩孚还取消了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反对苏俄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派张斯麟赴远东共和国同苏俄谈判。1922年，吴佩孚还发出通电，主张劳动立法和保护劳工。至于陈炯明，1918年率领援粤闽军击败闽督李厚基后，占领汀州、漳州、龙岩等地，建立了闽南护法区。1919年底，陈炯明在漳州办《闽星报》，称颂社会主义，赞扬俄国十月革命。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波塔斯夫等相继到漳州，他们也曾极力赞美陈炯明。共产国际甚至一度因为听信陈炯明方面的说辞，把孙中山看做“巧妙的外交家，谨小慎微的政治家，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者”。

“共产国际采取联合吴佩孚、陈炯明的政策，还出于苏俄国家利益的考虑。”李颖说，“俄国十月革命后，处境艰难。苏俄希望在中国寻找到一个同盟者，以实现中俄睦邻关系。这遵义会议会址。



个同盟者还必须对苏俄友好，不会侵犯其边界，还须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共产国际认为吴、陈具备这样的条件，而孙中山不具备。”然而，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苏俄联合吴佩孚的政策则早在1921年下半年就遇到困难，特别是1923年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后，中国工人阶级的鲜血令共产国际认识到，吴佩孚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才转而开始重视共产主义活动家马林的意见，通过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

与京汉铁路工人付出的鲜血证明吴佩孚不是靠谱的合作者有类似之处，国共合作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失败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与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纲领。这才有了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部著作。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俄罗斯莫斯科南部纳罗-福明斯克地区五一村召开。

2006年，李颖曾到访五一村，在村文化宫图书馆查到了五一村工厂日志，其中记载着中共六大在五一村召开的内容。在五一村村民的带领下，在废弃的仓库里，李颖发现了一张俄罗斯旧报纸，版面上“历史一页”栏目的文章名字是《五一村：中共六大》。仔细端详这些旧物，李颖若有所思：中国共产党是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懂得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促使他们拿起武器进行战斗。”李颖表示。

毛泽东曾讲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提及血雨腥风的“4·12”反革命政变，毛泽东还说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军旅作家王树增曾对《新民周刊》记者如此说：“中国共产党的前进之路，走过不少弯路，碰过不少钉子。但中国共产党从他的幼年期开始，就有自我纠偏、自我完善的一方面。看一个人看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不是多么巨大的成功，而是是否能勇于自我纠偏，勇于完善自我。”王树增曾用这样的观点审视长征，审视遵义会议，包括此前此后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扎西会议。王树增认为，这一系列会议，就是个纠错的过程，